

当青铜器遇上动漫

——《狞厉与肃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纹样》序

陈雍

青铜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合金之一，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或铜、锡、铅合金，跟古代西亚、欧洲的不完全一样，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轨迹。中国历史上以青铜制作器物的物质文化阶段被称为青铜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夏、商、周为代表的早期国家。

青铜器是夏、商、周三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历史的岁月给青铜器蒙上一层厚重的神秘色彩，远离了今天的社会生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把考古文物“冷知识”变成大众的认知，是考古文物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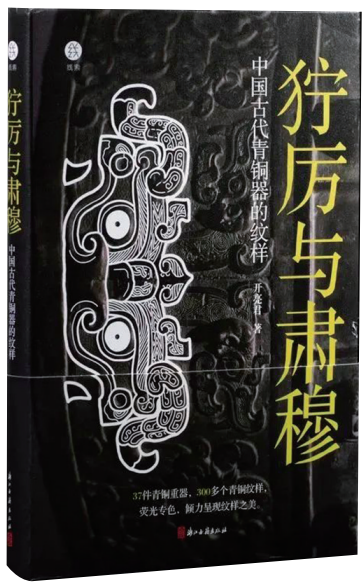
为了让中国古代青铜器“活”起来，开亮君把动漫的计算机绘图手段运用到青铜器上，在深颜色的青铜器图案里用高亮线条描摹出动物纹样，高亮线条与深色背景之间拉开距离，形成虚拟的景深，产生出动物纹样从青铜器里跳出来的视觉效果。例如，子仲姜盘里面塑造的各种小动物，在静静地等待水的召唤，当它们被高亮线条勾勒出来，再辅以动态的水波，就好像往盘子里注水形成的池塘，一下子小动物们活了起来，动了起来，禽戏、鱼游、蛙鸣，宛如一幅生动活泼的动漫。

开亮君还把动漫的计算机着色手段施展到青铜器上，用不同颜色描摹出动物纹样的构成与结构，体现出作者对纹样的理解与表达。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器身的纹饰相当繁复，一般读者不好理解。作者用不同颜色描摹出龙与凤、虎、蛇缠绕一起的样态，读者按照颜色就能够清楚地看出，龙、凤、虎、蛇的位置关系所体现的阶序，这样，象征化动物纹样的社会学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本书一共收录早商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37件，其中容器类29件，非容器类8件，容器类数量最多的是酒器（尊10件、觥5件、卣3件）和食器（鼎4件）。

商周时期青铜容器的整体造型分为两类，一类为“器”，整体造型与陶器器形类似，如鼎、鬲、壶、盂等；另一类为“物”，整体造型模仿某种动物的形状，如尊、觥、卣等。这类造型的青铜器有兽、禽、人三种。这本书收录模仿动物造型的青铜器集中在酒器类，有兽形和禽形两种。

商周时期青铜器纹饰的纹样，大量的和主要的是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动物纹样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对视觉形式的描述，如虎、牛、鸟、蛇等现实中的动物；另一种是对想象形式的创造，如饕餮、夔龙、凤等现实中没有的动物。这本书只收录了动物纹样，没有几何纹样。



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后母戊鼎，器身为肥遗纹、夔龙纹，鼎耳为虎食人纹和鱼纹，鼎足为兽面纹。肥遗纹、兽面纹和夔龙纹实际是同一种想象的动物。肥遗纹、兽面纹是这种想象动物的正视图，兽面纹又称为饕餮纹，即有首无身的肥遗；夔龙纹是这种想象动物的侧视图。饕餮，见于《吕氏春秋》；肥遗，见于《山海经》；夔，见于《山海经》《庄子》。

商代后母戊鼎的兽面纹（饕餮纹）和肥遗纹的构图，即人类学家所说的剖分表现法。莱维·斯特劳斯在“亚洲和美洲艺术中的部分表现法”中说：“商代装饰艺术的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它以一种特殊的方法把动物表现在一些平面或圆桶状的器物表面上。这就好像是人们捕获了动物将其纵剖开来，从尾部顶端开始，几乎直劈至鼻端，但不是完全劈开。然后将这两半分开，又将这一分为二的动物在器物表面摊平，两个半身的联结处只在其鼻端。”〔法〕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著，谢维扬、俞宜孟译：《结构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考古发现，中国史前时期的半坡文化彩陶纹样和良渚文化玉器纹样都是剖分表现法。

商代青铜器的“虎食人”器物造型和装饰纹样，学界有不同的理解。张光直认为，商代青铜器的动物纹样是与当时的人与动物的关系分不开的，这些动物很可能做过巫师的助理精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他说，对社会体系进行操纵的关键，在于社会与经济的分层，

在中国这种分层在三处从考古和文献资料可以证实的项目中取得表现，即宗族分支、聚落的等级体系（导致城市和国家）和萨满阶层以及萨满法器（包括美术宝藏）的独占。在分层的宇宙中，祖先和神居住在上层的层次。生人经由萨满或萨满一类的人物，借动物伴侣和法器——包括装饰着有关动物形象的礼器——的帮助与他们沟通。在像中国这样把祖先或神的智慧的赋予与统治的权力之间画等号的文明之中，对萨满服务的独占与美术宝藏——亦即萨满法器——的占有便是社会上层人士的必要条件。（张光直著，郭净译：《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曲枫认为，在萨满观念中，人和动物在本质上是相等的，人与动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型。萨满有动物助手，在由他们所带领的仪式上，他们和助手带上动物的皮、面具，运用其他特征以完成向动物的转型。按照这样的解释，后母戊鼎耳的虎食人纹，表现了巫师及其蒙着虎皮的助手，通过迷幻术（ecstasy）仪式与神界沟通。

他还认为，商周的青铜文化虽然是萨满式文明，但不能仅仅用萨满教的宇宙观、灵魂观、迷幻术等一般理论解释商周青铜器，而是需要用神经心理学作进一步解释。他建议用“意识变型”的物象——即人们的意识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下所看到的物象，解释商周青铜器中那些超现实的具象动物纹饰和抽象几何纹饰。按照他的说法看商代青铜器纹样，以鼻子为对称轴的兽面纹（饕餮纹）和肥遗纹，纠缠在一起的龙纹等动物纹样，以及涡纹、四瓣日纹、云雷纹、菱格纹等几何纹样，都能够用神经心理学“意识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模式做出认知方面的解读。（曲枫：《青铜与文字的婚礼——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这本书在没有被读者阅读之前，它只是一个“文本”，读者的阅读使这个“文本”转化为“作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并且应当用自己的认知去解读这个“文本”，只有这样，“作品”的意义才会显现出来。这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我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年轻的朋友们。

《狞厉与肃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纹样》

作者：开亮君

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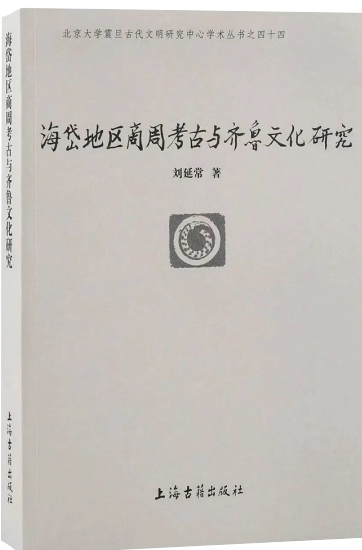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定价：218元

商周考古阐释齐鲁文化内涵与根脉

——《海岱地区商周考古与齐鲁文化研究》读后

邓浩然



海岱地区自史前时期的文化便自成体系，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重大课题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商、周时期，海岱地区作为中原王朝的东土，与王朝中心地区频繁交流和互动，在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了“夷夏东西”的格局，至秦代最终纳入统一王朝，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华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海岱地区商周考古与齐鲁文化研究》一书，通过翔实的考古资料为我们揭示了海岱地区从多元中的一元逐步融入王朝一体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细节、图景和路径。

本书精选了刘延常先生从事考古30余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商周考古、齐鲁文化、东夷文化、青铜器”四个部分为序，依次揭开了商文化、东夷文化、周文化、东周诸地域文化交流融合及此消彼长的历史进程。同时依据近年最新考古发现，系统梳理了海岱地区商周考古学文化谱系，对齐鲁文化的内涵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阐释。

在“商周考古研究”部分，详细梳理了20世纪海岱地区商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并结合鲁东南地区商代文化遗存及近年周代考古的新进展，重新阐释了商文化东渐及夷商、夷周关系，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和由此带来的新认识。例如，鲁东南地区商代考古与研究历来薄弱，刘延常先生进行调查梳理、明确时空框架，廓清该地区商代考古基本文化面貌，填补了学术空白。根据这些新发现，刘延常先生指出，商文化在海岱地区的分布有由早到晚、自西而东的过程，商人东征和商文化东渐主要通过北、中、南三条路线；北线沿泰沂山脉北侧向东推进；中线沿曲阜、泗水、平邑、费县一线向东推进；南线沿古泗水向南推进，向枣庄南部、临沂苍山、江苏北部扩张。商文化在上述三条路线的时空分布与聚落特点反映了商王朝经略东方的不同面相；在鲁西南和鲁南地区，商文化对当地土著文化实行替代式的东渐，体现了商王朝的东扩战略；而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的商文化遗存则是商王朝东征时遗留并在当地的遗存，当地土著的东夷人群没有被商王朝完全征服和管控。商代晚期遗留下来的这一历史格局进而深刻影响到西周分封及其统治策略。如齐国“因其俗，简其礼”，鲁国“变其制，革其礼”，都是这一政治文化图景对军事政治制度和统治措施的影响。刘延常先生认为，周人灭商后，周初分封改变了山东半岛的政治格局，西周早期周王室控制海岱地区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首先，从鲁北和鲁中南双线入手，分封姜齐镇抚鲁北，分封姬鲁镇抚鲁南；其次，在齐鲁两个核心封国周边分封诸小国，例如同分滕国协助镇抚鲁南等，形成次一级的政治中心；再次，在边缘地区以商王朝旧贵族进行填充，最终形成“主要封国——次级封国——般遗民——东夷土著”等不同圈层的区域政治模式。历史实践证明，周人的这一东土经略模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最

终将整个海岱地区纳入王朝一体格局之中。当然，这种经略模式和稳定结构并不是僵硬化甚至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动态变化和调整中，刘延常先生指出，从西周晚期开始，以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为核心分布区的东土青铜器群出现，反映出周王朝中央势力衰弱造成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以及海岱地区土著文化即东夷文化的复杂。可见这一经略模式成功的关键和依靠的核心力量是西周王朝中央的绝对力量。到东周时期，随着周王朝中央力量和对地方控制力的衰弱，主要封国齐、鲁便成为海岱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轴心。

在“齐鲁文化研究”部分，详细梳理了山东地区周代考古发现和概况。刘延常先生指出，考古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周代以齐国、鲁国为代表的东方地域文化，内涵包括海岱地区周代考古学文化、古国遗存和周边文化因素等三个层面，包含不同的成分结构、层次结构和形成过程。具体而言：齐文化是齐鲁文化的核心部分；鲁文化是中原周文化的延续，是周文化在山东地区的代表；莒文化分布于鲁南地区，与淮夷等古国联系密切；莱文化分布于胶东半岛，在以周文化为核心的基础上融合当地土著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风格；珍珠门文化是夷人文化，主要分布在胶东、鲁北和鲁南地区，是齐文化和莱文化形成的基因；鲁中泗水中游属南北交通要冲，是商和西周王朝东扩的桥梁，东周时期又是泗上十二诸侯国之腹地。刘延常先生认为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底色，西周王朝早期对东方的分封、征伐使得周、商、夷人文化初步交融；周文化进入胶东半岛后，以夷治夷的怀柔政策促成夷周并存，即“周文化背景下的东夷风格”。由此可见，东夷族群传统属地方文化基因，商王朝东渐使海岱地区成为商文化的东土，形成了商文化、

珍珠门文化、东夷文化交融共存的局面；西周早期周初分封齐、鲁等诸侯国，与中原文化、周边文化再度融合，在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时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齐鲁地域文化。

在“东夷文化研究”部分，主要梳理了古史传说时代、夏商周时期东夷文化的发展脉络，包括日照五莲丹土遗址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岳石文化王推官类型、晚商至西周早中期的珍珠门文化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刘延常先生曾主持发掘的丹土遗址，文化延续500多年，呈现出快速聚集、急速膨胀、突然衰弱的特点，作者认为这一特点反映了鲁东南区域文化演进多族群竞争下的格局和东夷族群势力发展、繁荣、重组与扩张。关于岳石文化，刘延常先生也有较深入的研究，认为岳石文化王推官类型可能来源于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同时吸收了七垣文化漳河型的文化因素；在岳石文化晚期，出现了城子崖岳石文化城、丁岳石文化城墩及桓台史家器物窖藏等大型重要考古遗存，形成了以城子崖遗址为中心的方国。关于珍珠门文化，刘延常先生认为它来源于岳石文化，主要分布在海岱地区东部，吸收了周文化和周文化的一部分因素，并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对应，提出珍珠门文化珍珠门类型遗存可能是嵎夷，会泉庄类型可能是莱夷。此外，刘延常先生还进一步放宽视野，探讨了东夷文化与日本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青铜器研究”部分，刘延常先生对山东地区出土青铜器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将山东地区先秦时期青铜器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着重探讨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山东地区东土青铜器的传承与转变，指出胶东半岛和鲁南地区是东土青铜器群的两大核心分布区，分别属于东夷古国中的莱国和莒国，为从青铜器角度探索东夷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我们不仅全方位了解了海岱地区早期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从多元之一融入中华一体的全部过程，更了解到刘延常先生三十多年来如一日始终坚持在田野发掘、业务交流、管理服务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学、思、践、悟，在日常繁重的工作之余，专研不辍，久久为功，立足考古学材料、考古学方法、考古学话语体系，同时钻研齐鲁优秀传统文化，在利用考古材料书写历史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躬身力行，矢志不渝，践行了考古学者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学习的地方。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海岱地区商周考古与齐鲁文化研究》

作者：刘延常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定价：138元

《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序

李晓东



1984年，李宝才同志从中山大学历史系专业分配到河北省文物局工作，岁月如梭，回想起来，我和宝才已相识近40年。

文物工作实践性很强，宝才同志到河北文物局后一直处于工作第一线，大量时间在工作现场，了解文物情况及保护问题，与省内的有关同志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具体办法，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实践出真知。他对工作中的经验和所思所想，认真归纳，写成文章。《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正是他近40年学习、实践、研究工作的写照。其中的文章既有实践性，又有一定的理论性，构成了这部《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特点。

文物工作专业性和政策法规性很强。所谓专业性强，是因为文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等特性决定的。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要做好文物工作，必须对文物的特性、特点、价值、作用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学习是重要的前提。宝才同志具有历史学专业的专业基础，为掌握文物知识和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几十年来，他不断接触河北的各类文物，结合不同文物保护情况进行研究，既为保护利用提供专业依据，又为保护不同文物、区别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总结，写出心得体会，构成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文物保护文章。这是《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二个重要特点。

文物工作政策法规性很强，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根据国家文物方针政策 and 法律法规开展工作，始终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做到依法保护、依法利用、依法管理。宝才同志在文物工作中，坚持按照文物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待和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并依据实践，总结经验归纳提升，写出文章，是结合文物工作实

际，以法治文和文物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是《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三个重要特点。

文物工作有诸多领域，每个领域从文物及其特点、保护文物个体与环境，以及相关问题，都不尽相同，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同领域的文物工作，需要区别对待。总的来说，文物工作，是其各领域工作的系统集成。宝才同志在河北省文

物局不同岗位工作时，能够针对上述不同情况，学习、实践、总结、研究。例如，修复一尊佛像，该项工作既不是他的工作职责，也不是他的专长，但需要和确定由他做时，他怀着对文物的挚爱和敬畏之心，认真学习、试验，谨慎对待，终于圆满完成了修复工作，得到了专家好评。他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传承匠心技艺是一项重要成果。《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中的文章，涉及文物价值与作用、依法保护管理、文物修复、博物馆纪念馆等领域，是他在文物工作不同领域实践、思考、辛勤耕耘的系列成果。这是《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四个重要特点。

宝才同志近40年在文物工作一线多个领域工作实践，经验积累、知识积累、成果积累，都为进一步综合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希望他珍惜和发挥这一优良，多开展一些综合研究，为加快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新时代文物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宝才同志《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出版之际，作为多年的同事和几十年联系交流，遂写了上述文字。是为序。

《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

作者：李宝才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定价：88元

让图录传递更多历史文化信息

冯冬梅

青海省博物馆编著的《海纳百川——青海历史文物展》一书已于2023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为青海省博物馆“1+3”系列展览“青海历史文物展”展览图录，分为“源远流长”“汉治河湟”“鲜卑西迁”“吐蕃东进”“青唐风云”“多元一统”六部分。青海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区，自古多民族汇聚于此，本书全方位展示了青海的历史沿革和人文变迁，是一本介绍青海历史文物的好书。

在笔者印象中，多数图录以图版为主，按照时代或者类别分成几部分，在各部分前面加上一段统领性文字。这种图录的功能多为展示，把文物展示出来，供相关人员鉴赏或研究。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图录一看而过，不能给人以更多有益的知识补充，让人意犹未尽。

《海纳百川——青海历史文物展》不仅用图版展示了文物，更在图版之间的各部分穿插以文字、图片和表格，把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地点提纲挈领地叙述出来，让人在欣赏文物的同时，对于在青海发生的文化交流、族群迁徙、经贸往来有初步了解，从而达到让文物发声、复原历史场景的目的。这本书更像是一部电影，再现了青海风云变幻的历史和民族融合进程。

与一般的图录相比，本书的写作手法新颖独特，具有三大亮点，下面详细介绍。

第一，架构丰满，脉络清晰，主次分明，层层递进。该书共分六个部分，每部分均有代表时代特征的标题和统领性文字。多数图录只做到这个层面，接下来就是具体的文物图版。本书则在每一部之下分成若干单元，单元下面又按时间或者事件细分，加上小标题，并且附上具体内容。例如，第二部分鲜卑西迁，下面分成政权频易、吐谷浑国、吐谷浑道三个单元。政权频易下面又分为西平大姓（郭、麴、田、卫）、南凉国、虎台遗址、乙弗勿敌国、乙弗部几个部分，除了文字介绍，还配有插

图、拓片和彩照，让读者在最短时间内对于这个时代的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有所了解。

第二，将历史人物贯穿各单元，还原历史事件。每一部分都有相应的历史人物出场，有些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比如汉武帝、隋炀帝等帝王，李息、徐自为、霍去病、赵充国等名将，弘化公主、文成公主等和亲公主，喇勤、贾巴饶赛、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等藏传佛教大师。人物是历史场景中最闪光的部分，有了他们，我们更愿意去探究他是谁，做了什么，在历史上起到哪些作用。读者看完人物介绍之后，对于文物就会有更加具象的理解，进而达到让文物说话的效果。

第三，采取多种表现形式，全方位展现文物背后的故事。在各单元文物图版前面的文字中，作者加入遗址照片、发掘现场照、拓片、线图、表格，作为文字的辅助介绍，既补充了知识，又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例如，介绍隋炀帝西征并在吐谷浑设郡时，作者就配了一幅隋炀帝画像，这比单纯用文字更让人印象深刻；讲述唐代弘化公主时，还配有墓志拓片。此外，讲述吐谷浑王名称、吐谷浑道发生的主要事件、唐蕃会盟事件时，直接以表格形式呈现。这些手段的应用增加了本书的知识含量，让读者充分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对青海历史文物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综上所述，《海纳百川——青海历史文物展》一书在介绍文物的同时，用层层递进的架构、历史人物的穿插勾勒、多种表现形式来讲述青海历史，该书在如何让读者更轻松地了解历史、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作者单位：文物出版社）

《海纳百川——青海历史文物展》

编著：青海省博物馆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定价：460元